
葡月的错位

作者：张皓翔

ORCID: 0009-0001-2997-7726

前言

2026 年 9 月到 10 月，以法国为中心的一场运动，为我们带来了观察 21 世纪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绝佳窗口，也引发了社会上的广泛讨论。此前，我们以四篇单独时评的形式，先后发表在 libcom 平台上，随着运动的进展，一篇一篇展开。这四篇作品并不是独立的理论阐释，而是依托《要素的枷锁》《在罗陀斯的土地上起一曲玫瑰花的舞》与《资本的当代升维》为代表的整个理论体系展开的。现在，我们找到了机会，将它们合并成一册，并补上了一些注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理论从书斋里拿出来，放到真正的运动场上试用。

张皓翔

2026 年 10 月 24 日

目录

(一) 21 世纪的破局者与意识形态的合谋.....	2
(二) 国民经济学的幻象与政治经济学的极化[].....	4
(三) 现实关系的财富与两种斗争.....	7
(四) 被误认的社会主义与拒绝联结的抗争者.....	9

(一) 21 世纪的破局者与意识形态的合谋

自 2026 年 9 月开始，一场以法国为中心，并迅速蔓延至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等欧洲多国的示威——至少在这里，我们并不认为它称得上革命——活动迅速展开。

这场运动在 21 世纪的今天，用实践再次印证了我们在之前提出的理论预判：处于教育系统末端、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学生群体，其技能塑造与价值取向已被资本逻辑深度预设与编程，他们处于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被系统性剥夺的前沿。这一群体应当被归为无产阶级预备队或者说准无产阶级；他们在共产主义的实现道路上，充当着殖民逻辑的率先破局者与解放意识的初期点燃者。

[1]

同时，这场运动也像一记闷棍，揭露了许多我们此前因理论的傲慢与历史案例的惯性而忽视的问题。这是一场关于 21 世纪革命的前哨，也是我们既有思辨止步的地方。

2026 年 9 月 17 日，法国巴黎东南郊。克雷泰伊圣埃克苏佩里高中的学生与教师，因学校设施老旧、师资资源长期短缺等问题发起了抗议。自此，一场以学生群体为核心、多个利益集团共同参与的动荡拉开了帷幕。到 9 月 29 日，法国高中学生工会联盟（UNL）联合学生联盟（USL）发起了首次全国性封锁行动，并与公共部门工会的抗议交织在一起。到了 10 月初，法国境内千余所高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封锁与停课影响。法国内政部与教育部迅速将其定性为“城市暴力”（violences urbaines），警务部门大肆拘留未成年学生。

极为荒唐的一幕在欧洲这片曾经充斥着革命与激情的热土上重演：镇压性国家机器再次将枪口对准了一群手无寸铁的学生。从 1848 年六月起义中资产阶级共和派对工人与青年学子的卡芬雅克式屠杀，到 1871 年巴黎公社墙下屠夫梯也尔的血腥清算，再到 1968 年“五月风暴”中戴高乐政府用警棍与催泪弹对拉美丁区的清洗——法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时刻以暴力维持秩序——毋宁说维持资产阶级利益秩序——的阶级本能暴露无遗，哪怕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根本无法伤害统治根基、仅仅希望改善自身生存处境的学生。随着统治阶级暴力手段的介入，运动从最初的示威迈入动荡，这场由资产阶级自身酿成的灾祸，由此从校园扩展到了街头。

10 月 6 日，大学生、教师工会与家长全面接入；10 月 13 日，环保与人权组织加入，学生联盟号召联结“黄马甲”；10 月 17 日至 18 日，极左翼黑块与“黄马甲”融合，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但这并不是任何政治意义上的进步革命。它的真正价值在于，为我们讨论 21 世纪的社会运动与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时代切口。

它的进步意义，在于再次用实践证明了学生群体的准无产阶级性质及其革命前哨的地位。同时，它也暴露了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斗争形式与工业时代的巨大差异，逼迫我们直面许多长期不愿承认的时代矛盾。这次运动，同样呼应了我们在《在罗陀斯的土地上起一曲玫瑰花的舞》一书中的时代化论断：阶级斗争作

[1] 参照作者前序作品《资本的当代升维》一书独立 DOI 10.5281/zenodo.18244088 【下载链接：<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91350>】

为地火从未熄灭，但把人们联结起来、让斗争得以显形的引力机制，会随着物质生产条件的改变而迁移。今天的身份政治与新联结是进步但错位的形式，而这一错位的形式，最终将在新的矛盾运动下重新校正回阶级的地基之上。^[2]

关于这场运动，当前充斥于爱丽舍宫新闻发布会、主流中产媒体乃至自由派智库中的主导性解释，无一例外地将其定性为“一场社会参与度极广、由多样化诉求交织而成的多阶层抗议联盟”。从法国内政部关于“多元利益冲突”的官方声明，到《世界报》等主流媒体将学生、环保客、传统工会与“黄马甲”撕裂为利益互异的“社会碎片”，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精心勾勒出一幅极度复杂的平权与议题平民化图景——而这正构成了他们解释并平息这一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点。

以这一逻辑为原点的解释，对于资产阶级政府而言，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整体性的阶级对抗降维处理为“幼稚而无理的群盲现象”，以强化其作为“公共秩序与理性裁判者”的正当性。这使得资产阶级统治者得以避开自身无法招架的阶级斗争叙事，免于将真正具有力量的广大产业劳动者推向统治阶级的对立面。这套叙事通过“多元”、“身份认同”与“议题平权”，成功将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消解成了多元诉求的极端表达。

而这套叙事，也恰好迎合了参与这场运动的斗争者自身的心理诉求。借助这种“多阶层自发联盟”的叙事，他们可以将自身对政党领导的强烈排斥、对铁的组织纪律的盲目警惕乃至政治割裂的态度合理化；甚至当这场运动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惨败时，这套叙事也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免责声明——他们不必去反思自身的幼稚与过错，不必去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不必去研判时代矛盾的运动，大可借此相互推诿，指责是其他群体的利益诉求不一导致了运动的破裂。

这套叙事再怎么八面玲珑、四方美人，它终归背叛了现实。而远离实践，便是政治分析的大罪。

事实上，这场运动绝不是是什么多阶层广泛参与的多元诉求联合，而是在 21 世纪物质生产条件高度发展下，无产阶级内部发生深刻分化、诉求趋向碎片化、群体趋向多样化的一次具体体现。由于缺乏科学纲领的引导与先进政党的整合，无产阶级内部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加之运动多由未能深入且广泛联系产业劳动者的边缘群体发起，便进一步局限于自身的群体利益，而非阶级整体的核心利益，最终呈现为一场多样化诉求相互交织的错位运动。

我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将这次运动看作“多阶层联合”，而坚持其仅仅是无产阶级内部诉求分化的表象，是有着严密的政治经济学依据的。

当下主流的社会分层范式主要依赖两种路径：一种是传统工业时代基于生产资料法律占有权的机械表述，另一种则是韦伯式的财富、地位与权力多元分层范式。然而，随着数字时代数据、算法、平台等新型生产资料复杂占有形式的出现，经典占有论难以描述劳动者“在形式上占有技能与股权，但实质上高度依附于资本”的矛盾状态；而韦伯式的分层范式将财富、地位与权力并置为多元平行标准，在方法论上消解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停留在社会表象的描述——解释不平等却回避剥削，描述分层却模糊对抗，诊断冲突却消解革命。

因此，我们在《资本的当代升维》一书中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阶级划分标准：以“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为核心锚点。阶级差异的本质，是“对自身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自主支配能力”与“对他人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支配能力”的分配差异。并据此构筑了“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生产完整性—对劳动

^[2] 参照作者前序作品《在罗陀斯的土地上起一曲玫瑰花的舞》一书独立 DOI 10.5281/zenodo.22975869 【下载链接：<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91350>】

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三元联动辩证分析框架。^[3]

以此标准衡量，本次运动的参与者——从处于劳动力重置末端的学生，到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的工会成员，再到被边缘化的“黄马甲”群体——在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无一例外地应当归入无产阶级。主流叙事中所谓的“多阶层”，不过是资产阶级学者将社会分工与议题标签误认作阶级壁垒的产物。这本质上是一场披着小资产阶级习气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出卖了现实条件后的意识形态合谋。

但至少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这次行动绝非多阶层的胜利联合，而是一场 21 世纪无产阶级的内部利益诉求分化之后，且同时缺乏科学的纲领与先进的政党领导，忽视了广大产业劳动者的根本力量之后，所展开的一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场运动的形式极为激进，内核却极为守旧。它高呼“国家只听得懂火光与瓦斯的声音”，高喊“我们没有未来，你们就没有秩序”，却在政治上拒绝阶级认同、拒绝统一纲领，退回了前马克思主义的自发阶段。这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具有着复杂历史背景与新的社会条件下所塑造出来的新的斗争形式，这也正是我们后文所分析的重点。

（二）国民经济学的幻象与政治经济学的极化^[4]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曾给出过“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5]，但是他忘了强调的一点是这里的“资产”与“无产”绝非国民经济意义上的“资产”与“无产”，而是政治经济意义上的“资产”与“无产”。

而这场运动同时向我们传递了三个信息：

1. 马克思的那个论断是怎样在 21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以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愈演愈烈的；

2. 这一论断又如何因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分野而无法被正确认识的；

3. 当越来越多的国民经济学意义上的小生产者被抛入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无产者队伍之后，他们如何因为自身的国民经济学运动而割裂着无产阶级的统一政治意志，带来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呢？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强调过，阶级划分的标准是以“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为核心锚点。阶级差异的本质，是“对自身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实际掌控能力”，与“对他人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支配能力”的分配差异。^[6]

以这一分析框架审视当下社会结构，便可清晰辨认出资本支配形式的变化：

一位学者在庸俗经济学家的分析中显然属于中产阶级，但当这位学者被绩效深度规训，甚至连自身研究的方向也无法自主决定时，他对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几乎为零。

一个连锁店店主看似占有着店铺的生产资料，但他经营的深度受到总部的指令安排。再如那些拥有高薪与技术技能的高级程序员或平台创作者，其劳动过程同

^[3] 参照作者前序作品《资本的当代升维》一书独立 DOI 10.5281/zenodo.18244088 【下载链接：<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91350>】

^[4] 其实这里强调的也就是一种“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当代深化，这一部分的深度讨论会在第四节再次提及

^[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6] 参照作者前序作品《资本的当代升维》一书独立 DOI 10.5281/zenodo.18244088 【下载链接：<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91350>】

样受到算法逻辑与数据接口的微观监控。

这些在工业时代是难以实现的。在十八、十九世纪，由于缺乏及时的通讯工具与互联网的大数据联网，对劳动力生产的支配，往往只能假借于对实体生产资料的占有这一中介来实现。

于是一种深度的错位与历史的盲区便出现了。马克思所处的工业时代，因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使得他们在阶级分析上无法拨开实物或物质生产资料占有的表象，去触及劳动力的核心。

因此，当我们拿起了“劳动力”的透镜，我们便会发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数字时代的到来，跨时空的即时管理与统一支配能力得以实现。资本的支配越来越不加掩饰地以对劳动力的直接支配为核心与表象的统一，于是阶级的两极分化也愈发明显。

当然，我们所说的阶级两极分化，并非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者的内部皆已实现了质与量的完全统一，并实现着完美的对立。

阶级内部质的统一固然已经实现，皆为“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系统性丧失的群体。但阶级内部必然且必须存在着量的差异。

“必然”是由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划分越来越只能依据其核心的根本差异——即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条件的充盈，决定了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形式的多样，是历史的必然。

“必须”则是因为无产阶级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个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等量上的区别是必然的趋势，也正是无产阶级所追求的解放的组成部分之一。强行将多样的独特的人化一为一致的，是一种“要素化”的表现，是背离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悖逆之举。

因此，阶级的两极分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预设，更是一个已经开始且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历史进程。只不过历史绝不会像那些庸俗教条主义者所设想那样，为他们展开一幅洁净纯粹、充满理想主义、毋宁说是空想主义色彩的如铁板一块的无产阶级整体，或者说质与量完全统一的无产阶级整体。

同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以国民经济学为代表的学者与理论家总喜欢用“中产阶级扩大论”、“无产阶级消亡论”、“技术技能资本化”等狂言妄语来宣称马克思的两极对立论的过时。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因历史条件的限制、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他们对阶级的本质差异及其外化的划分标准，不可避免地浮于了实体法权占有的表象，而未能触及劳动力在阶级差异的本质核心地位——至少他们未能清晰地、系统地去论证——从而给了这群跃跃狂徒留出了叫嚣的空子。这一群资产阶级的学者错将——毋宁说是故意——将马恩因历史局限而聚焦于实体生产资料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歪曲为形而上学的法权占有论，与国民经济学去接轨，以支持他们那些漏洞百出的“中产阶级扩大论”。而也正是这一群资产阶级的学者在大肆炫耀，以至于我们在长期以来竟真的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消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也随之被缓和，剩下的是劳资矛盾，剩下的是可以通过高福利、高待遇去调和的矛盾。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狼子野心。

当越来越多在国民经济学或庸俗经济学上将自身认同为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高人一等的群体，在政治经济学上被抛入了无产者的队伍时，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气息便极大地影响着整个无产阶级队伍。

必须明确的是，这里的小资产阶级气息并不指他们过着一个相对充盈的物质生

活——喝咖啡、吃饱饭——这些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氣息，而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物质充盈。教条主义者常常将这些误归为享乐主义，并以此指责无产阶级队伍，这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相反，最核心的小资产阶级氣息，在于政治与经济上的妥协、摇摆与不坚定，在于利益上的个人主义崇拜，以及对集中纪律与统一意志的本能抵触。这种习气在当下的斗争中集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革命政党与统一纪律的盲目排斥，将其降维为无政府主义式的自发崇拜。在这次以法国为核心的动荡中，参与者普遍展现出一种对集中领导与组织纪律的狂热警惕，企图用原子化的自发联结去对抗高度组织化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导致运动极易陷入无方向的空耗。这当然具有其社会条件与历史背景，但这并不能成为为他们开脱罪责的免责声明。

第二，是他们完成了第一步的联结——基于爱好与身份认同的联结，但没有完成第二步同阶级地基的联结。他们排斥联合最广大、最具有力量的产业劳动者群体，无法真正地与他们联合在一起，无法将自身边缘化的群体性身份认同诉求，同核心的、根本的阶级利益诉求联系起来。他们的斗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以爱好和身份认同为引力机制的联合，而非阶级利益的联合，甚至许多斗争在最后演变为了一种彰显个性的文化表演，而非严肃的政治斗争。^[7]

第三，从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21 世纪的阶级斗争确实面临着 19 世纪共产国际与工人运动所未曾遭遇过的全新难题与机遇。

它的机遇在于，在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层面上，随着资本对劳动力生产支配的不断深入，阶级矛盾与两极对立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深刻、更加尖锐。学生群体作为革命的前哨，再一次在欧洲的土地上率先点燃了斗争的火焰，展现了其作为解放意识初期点燃者的历史地位。

但它的难题则更为严峻，并在这次运动中集中爆发了出来：这就是“如何从以爱好、身份认同与个体特性为核心的联结机制，重新跨越并迈回到共同的阶级地基之上”^[8]。这种以个体特性和精神需要为圆心的新联结，本身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标志着生产力发展使人类获得了余裕去追求本我的展开与个性的释放。然而，它同时也是这个时代的深刻难题：当这种联结仅仅停留在私人的、审美的、身份认同的圈子里，而无法将其推进到第二步——即同客观的阶级利益地基实现重新统一时，它就只能沦为物质大解放所撒下的一点点残羹冷炙，甚至被资本的商品化逻辑所收编。

在这次运动中，这一难题彻底爆发了：学生及边缘群体虽然完成了基于身份与诉求的第一步联结，但由于缺乏将这种联结导向阶级地基的自觉机制，导致整场运动在缺少科学纲领、缺乏统一政治意志、未能同广大产业劳动者建立有机联系的情况下，最终呈现出一种形式上高度激进、内核上却依然保守与自发的“错位”形态。

(三) 现实关系的财富与两种斗争

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是无法仅仅被物质所喂饱的。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写下这样一句警醒后世的论断：

^[7] 参照作者前序作品《在罗陀斯的土地上起一曲玫瑰花的舞》一书独立 DOI 10.5281/zenodo.22975869 【下载链接：<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91350>】

^[8] 同上

“个人的真正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现实关系的财富。”^[9]这里的“现实关系的财富”，绝非国民经济学视野下简单的物质财产积聚，更不是庸俗唯物主义所幻想的实物占有数量。它强调的从来不是某种绝对的财产多寡，而是一种现实的、实践的、社会关系的成熟程度。

在工业时代，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马克思与恩格斯固然未能将这一“现实关系的财富”在政治经济学层面进行完备的定量定义，但他们早已敏锐地洞察到它与单纯财产占有的本质区别。在哲学层面，他们将这两者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界线。“现实关系的财富”所涵盖的，固然包含物质财富，但它彻底扬弃了形而上学看待财产的狭隘视角，转而确立了一种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即由其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资本—雇佣—权力”架构下动态而非静止、辩证而非孤立的财富。它关乎的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能否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获得主体性的展开，而非仅仅作为生物体获得卡路里与庇护所的供给。

然而，二十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卫道士们，却极其卑劣地歪曲了这一哲学论断。他们将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分野用意识形态烟雾遮蔽起来，试图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来掩盖“社会关系的彻底异化与剥夺”。他们将历史局限下马克思聚焦于实体生产资料法权占有的表象，歪曲为形而上学的财产多少论；错误地将“生活决定意识”误读为了“物质决定意识”，将“现实关系的财富决定精神财富”误读为了“绝对的财产多少决定了精神的盈亏”。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其名著《静默革命》中大肆宣扬：“例如，一个在沙漠中迷路的人，可能会执着于对水的需求……一旦他的食物供应达到了维持生存的水平……西方社会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就已经跨越了这些阶段，今天正在追求与经济安全命令不再有直接关系的利益目标。”【A man lost in a desert, for example, may be obsessed by his need for water... Once his food supply has reached a subsistence level... important groups among the populations of Western societies have passed beyond these stages, and today are acting in pursuit of goals which no longer have a direct relationship to the imperatives of economic security.】^[10]同样，安东尼·加斯科尔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也做出了如出一辙的断言：“没有证据表明贫困化在加剧。相反，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急剧上升，凯恩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失业，战前不景气和大众苦难的旧循环已被打破。工人现在在现有秩序中拥有利益，拥有稳定的就业、福利保障、养老金和不断增加的实际工资；因此，马克思建立在物质贫困基础上的革命颠覆动机，对于绝大多数劳动人口来说已经消失了。”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increasing immiseration. On the contrary, working-class living standards have risen sharply, unemployment has been largely abolished by Keynesian demand management, and the old pre-war cycle of slump and mass misery has been broken. The worker now has a stake in the existing order, with secure employment, welfare benefits, pensions and rising real wages; the motive for revolutionary overturn, which Marx grounded in material destitution, has therefore vanished for the bulk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11]

^[9]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页

^[10]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叶娟丽、韩瑞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年版

^[11]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Anthony Crosl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6

这些理论家们沾沾自喜地宣称，马克思的革命逻辑已经伴随着高工资、高福利与高消费的到来而彻底过时。他们以为，只要用物质温饱与消费主义的“面包与马戏”塞满劳动者的肚子，革命的引线就会被永远切断。

但这群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们彻底搞错了对象。他们有一点没有说错：劳动者确实不再单纯为自己作为生物体的人的生存而斗争了；但他们完全视而不见的是，人们仍会为了自己作为社会体的人的生存而斗争！后一种斗争，是比争夺一日三餐更高级的斗争，也是比诉求福利让步更深刻、更为彻底的斗争。它不再仅仅满足于革除某一种具体的分配不公，而是直指其“现实关系的财富”！

随着生产力的飞跃以及资本的当代升维，数字资本主义将算法、数据、平台与即时通讯技术全面引入生产过程，我们终于可以进一步将马克思文本中的这一哲学概念，进行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升维。在当下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现实关系的财富”的实质，就是对个体与社会的劳动力商品生产的实际掌握能力。它在关系上是一种“资本—雇佣—权力”的关系网，在哲学上则是动态的、辩证的现实关系之展现。

在传统的工业时代，对劳动力生产的支配往往需要假借于对实体生产资料（如厂房、机器）的法权占有这一中介来实现。这使得庸俗经济学者得以用“法权占有”来掩盖真正的支配关系。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劳动力生产过程的支配已经脱去了实体的中介，实现了直接的、无孔不入的微观渗透。无论是被绩效与科研指标深度规训的高校学者、被总部算法微观监控的加盟店主，还是拥有高薪却被接口与代码全天候束缚的高级程序员，他们在国民经济学意义上或许拥有丰厚的薪水、房产与股票，被划分归入所谓的“中产阶级”；但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他们对自身劳动力生产过程的自主支配能力几乎为零。

他们拥有物质产品的消费权，却丧失了作为“社会体的人”的生产主导权。他们所获得的物质财富，不过是资本为了实现劳动力再生产而预付的生产成本；而他们所丧失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则是作为一个人自由展开自身生命活动、自主掌控自身劳动力生产过程的全部可能。当这种“现实关系的财富”被剥夺殆尽，当劳动者被异化为仅仅维持系统运转的神经元与数据接口时，冲突便不再源于肚子的饥饿，而源于灵魂的窒息与社会性存在感的断裂。

因此“第二种斗争”，其深刻性与彻底性在于，它所指向的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私有制法权表象，而是托举着私有制最深层的根基——劳动力的要素化^[12]。

要深刻理解第二种斗争的终极指向，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劳动力要素化的历史本质及其与私人掌控的耦合过程。劳动力要素化，是将人的活的生命活动，从混沌的、自由的生命整体中强行剥离、抽象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被独立识别、精确衡量、跨时空安排和系统调配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要素化固然是人类生产力飞跃的组织前提，但它同时也是压迫的总根源。因为在要素化的那一刻起，劳动者就已经丧失了对自己生命支出的完整自主权，其生命被降维变成了生产系统中的一个变量。而当这种已经被要素化的劳动力，与排他性的私人掌控——无论这种掌控在中世纪表现为土地所有权，还是在今天表现为资本对算法、数据及平台生产资料的垄断——相结合时，压迫便升级为了系统性的剥削。^[13]

在第一种斗争中，即工业时代的传统工人运动，往往聚焦于“剥削的量”的调

^[12] 劳动力的要素化这一概念在作者的前序作品《要素的枷锁》（独立 DOI 10.5281/zenodo.19753290）一文中得到系统性、体系性的阐释【下载链接：<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91350>】。

^[13] 参照作者前序作品《要素的枷锁》一书独立 DOI 10.5281/zenodo.19753290【下载链接：<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91350>】

和，即争取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时、更完善的福利待遇。它在本质上是在承认劳动力作为买卖商品的要素化前提下，就“要素的价格与使用强度”与资本进行讨价还价。资产阶级卫道士们所津津乐道的“高福利社会”，无非是资本为了确保劳动力要素的高效运转而支付的更昂贵维护费。

而第二种斗争，则是要彻底否定“人作为要素”这一历史前提本身！它直指托举着私有制最深层的根基——劳动力的要素化。它不再满足于在“资本—雇佣—权力”的关系网络中争取更好的被支配地位，而是要夺回“对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实际掌控能力”。它要消灭的，不仅是剩余价值的榨取者，更是将人的意识、智力、情感与体力强行打包切割为“生产要素”的整套资本主义生产逻辑。

然而，正是在当前的现实博弈中，我们看到了最令人警醒的“葡月错位”。

观照 2026 年 9 月至 10 月间以法国为中心爆发、随后席卷欧洲多国的庞大社会抗争运动，其内在特征恰恰印证了这种路线上的混乱。从巴黎郊区高中生封锁校门的抗议，到“青年黄马甲”在街头的呐喊，再到工会与极左翼力量的迅速卷入，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却绝非一场摧毁旧世界秩序的阶级革命。

这场运动的悲剧性与错位感在于：青年学生与准无产阶级群体感受到了现实关系财富被剥夺的窒息感，他们拒绝被规训为资本大厦中干瘪的生产要素，试图直接发起一场诉求“主体尊严、解构权力压迫、去要素化”的第二种斗争。然而，他们既没有经过第一种斗争的严密锤炼，也没有建立起坚实的阶级组织与政治建构，更没有能力去撼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法权根基与国家机器。

这种脱离了历史阶段的空想抗争，最终沦为了无政府主义式的街头宣泄与碎片化的情绪表达。人们试图通过占据广场、网络声讨与去中心化的非暴力抵抗，来对抗早已深度融入社会血脉的资本逻辑。这恰恰混淆了解决“剥削机制”与消除“压迫根源”的历史先后顺序。其结果必然是：缺乏组织核心与政治纲领，特别是缺乏经过第一种斗争所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的“第二种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建制化力量的围剿与微小福利妥协的分化下将迅速破碎，最终再次落入被资本统治秩序轻易收买和解构的宿命。

历史的辩证法绝不允许这种轻佻的跨越。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以彻底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为核心的第一种斗争作为坚实的政治基础与经济基础，任何关于“去要素化”与“夺回现实关系财富”的第二种斗争，都只能是流于空中楼阁的文艺复兴式幻想。

第一种斗争，是第二种斗争得以真正展开的不可逾越的前置条件。唯有通过第一种斗争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夺回了生产资料与社会总成果的统筹权，劳动者才有可能在根本上获得消灭“劳动力要素化”的历史舞台。

（四）被误认的社会主义与拒绝联结的抗争者

1851 年 12 月中旬，英国伦敦索霍区迪恩街 28 号房间中，一位正值壮年却已肝病缠身、背部生痛的斗士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4]

而同一个人，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他还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的一句话做过一次重要的补充。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

^[14] 指的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后文中关于黑格尔的那一句同样出自这本书。

——一次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作为笑剧出现。

一个半世纪之后，历史确实再次重现了历史，呈现了一场对看客与资产阶级而言的笑剧，但却是对 21 世纪的无产阶级与共产主义事业自身的严肃拷问。2026 年 9 月到 10 月的这场葡月运动，表现出了一种极为扎眼的特征：高度的去中心化、去政党化，极度的警惕政党的组织与联结。

这不是偶然，这是两个时代之间一次意味深长的回声。

马克思当年写下"马铃薯"这个比喻，说的是法国的农民。他们利益一致，处境相同，却像一袋马铃薯里的一个个马铃薯，被装进同一个麻袋，却彼此隔绝，无法联结为一个阶级。那是"不能联结"——历史条件不成熟，生产关系没有把他们拧成一股绳，他们无法自己代表自己，于是把一个冒险家推上了王座。

一个半世纪之后的这场运动，恰恰翻了个个儿。这一代抗争者不是"不能联结"，而是"拒绝联结"。他们拥有比 1851 年的法国农民丰富得多的联结手段，互联网与即时通讯让同一种愤怒在几小时之内席卷整个欧洲。他们也不是没有联结过——他们基于爱好、基于身份认同、基于对同一套压迫的共同感受，迅速地聚拢在一起。可他们偏偏在最关键的一步停了下来，拒绝走向那个唯一能让他们真正成为"自为阶级"的联结。他们拒绝政党，拒绝组织，拒绝纪律，把这一切都当作需要警惕的东西。

这里必须澄清一层，否则就会把这场运动读浅。

有人把这解释成"新一代吃饱了撑的"——物质丰裕了，于是去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尊严"与"意义"。这是资产阶级理论家最愿意听到的说法，因为它把一场严肃的社会矛盾，降格成了青春期的叛逆。事实恰恰相反，这场运动的严肃性，正在于它所反对的东西比饥饿更深。

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他第一要解决的，是生理性的生存，是吃饱饭。在这一点上，这一代人是幸运的，生产力发展，让欧洲劳动者从"吃不饱"迈进了"能吃饱"的状态。那种温饱的满足是实实在在的，谁也不能否认。

但人同时是一个社会体。吃饱了的人，还会继续追问：我是不是只能作为一个零件，被安排、被买卖、被征用？这才是这场运动真正的痛点。他们反对的，已经不是"我吃不饱"，甚至不是"我被剥削了剩余价值"，而是"在资本—雇佣—权力这套关系里，我现实关系的财富被剥夺了——我仍然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活，只能作为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被随意地安排"。

这不是两个矛盾，而是同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劳动者与要素化压迫之间的矛盾从未消失，只是它的主要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了迁移——从"肚子"迁到了"灵魂"，从"生存"迁到了"存在"。早期，生理性生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支配着斗争的方向；如今，主体性的存在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这场运动的前哨与先锋不再是产业劳动者——产业劳动者仍在为第一个方面而斗争也必须为第一方面而斗争——而是学生、是黄马甲、是那些真切感受到了"现实关系的财富"被剥夺的青年。这也就解释了一个让许多观察者困惑的现象：为什么这一次站出来的，不是工厂里的工人，而是学生。

但要理解他们为什么"拒绝联结"，尤其是为什么对"政党"这个形式怀着如此深的警惕，就必须回到那个被误认了的历史。

20 世纪的冷战，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标杆。它废除私有制，宣布自己走上了人的解放的道路，然而它走偏了——它用手段替换了目的，把"计划"这个本该只是手段的东西，当成了自己要到达的彼岸。它去除了私有制，却没有去除要素化。而要素化，恰恰具有和资本一样的扩张本性：资本要把一切都卷入资本逻辑，要

素化要把一切都要素化掉。

于是一幕历史的荒诞剧上演了。苏联这个废除了私有制的国家，借着要素化，不断地要素化着欧洲的劳动者^[15]。那些劳动者忽然发现，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者，因为美苏争霸迫使资本让渡了更多的自由，反而过得“更舒服”；而那个号称解放了人的国家，却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它那要素化的计划里，试图让他们臣服。

这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更不能归结为“历史的定点”。苏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人们的选择，是路径；而在那个历史条件下，要素化无法被彻底去除，这是必然。于是路径与必然撞在了一起：人们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条路径，却没能在这条路径上扬弃掉要素化这个必然，要素化便借着“计划”这个形态，在新路径里存续了下来。而后人把这一存续，误认成了路径本身的性质——“社会主义只有计划一种形式”。

这才是釜底抽薪的一刀。苏联不是要素化的反面，而是要素化在另一条路径上的延续。它证明的，不是“社会主义错了”，而是一个更残酷的真理：在生产力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扬弃要素化的阶段，废除私有制，只能把要素化从“买卖”换成“安排”，却不能消灭它本身。资本主义是“买卖”形态的要素化，苏联是“安排”形态的要素化——两者是同一个压迫的两种面孔，谁也不是谁的解放。

理解了这一层，才能读懂这一代抗争者那种“警惕”的真实含义。

他们警惕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甚至不是斯大林这个具体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不知道“要素化”这个概念。但他们用身体记住了那个被概念所指认的现实——一种“即使去除了资本，我仍然无法作为一个主体的人去存活，仍然被当作一个零件随意安排”的生活方式。

他们警惕的，从来不是某一标签，而是标签的所指。不是组织纪律本身，不是目标本身，而是那个“去除了私有制、却保留了要素化”的状态。他们曾经的生活告诉他们：废除了私有制，人也未必解放；没有了资本家，你依然可以被计划安排得明明白白。

但指出了这个历史条件，绝不等于认同这场运动的去政党化。恰恰相反，这是因噎废食。

劳动者对政党的警惕，有它真实的历史根源，这一点必须承认，也必须理解。但把“警惕可能异化的组织”推到极端，变成“拒绝一切组织”，就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苏联的教训，提醒着我们对要素化这一更深刻的问题的讨论与思考。而不是否定组织本身。没有先锋队，没有组织纪律，没有政党，去对抗一个高度组织化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异于以卵击石。

至于“去政党化”是否在某一时刻成为可讨论的议题，那要等到另一个历史阶段，等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革命，革除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公有制，但即使如此，这也只是一个可讨论的议题，而非一定的必然选择。第一种斗争——打破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须、也只能依靠先锋队、组织纪律和政党来完成，这是不可逾越的前提。没有第一种斗争奠定的公有制基础，任何去要素化、去政党化的幻想，都只能是空中楼阁。这正是这场运动错位的根子所在：它跳过了第一种斗争，直接发起第二种斗争，用一个拒绝组织的姿态，去对抗一个高度组织的对手。

于是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开头那句关于悲剧与笑剧的话。

^[15] 参照作者前序作品《要素的枷锁》一书独立 DOI 10.5281/zenodo.19753290 【下载链接：<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91350>】

1851 年，法国农民因为不能联结，把一个冒险家推上了王座，那是一场悲剧。今天，这一代抗争者因为拒绝联结，把一场本该严肃的斗争，演成了一场对看客与资产阶级而言的笑剧。马铃薯的比喻没有过时，它只是换了主角——当年是"不能联结"，如今是"拒绝联结"。而历史的教训是：无论是不能联结，还是拒绝联结，联结的缺席，最后都只会让那个真正掌握着组织的力量的人，坐收渔利。

火光可以烧穿一间教室的门，却烧不穿资本编织的要素化之网。要烧穿这网，需要的恰恰是这场运动所拒绝的东西——组织，纪律，和一个真正的党。